

■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亚洲新未来

——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
与地区秩序

THE NEW FUTURE

OF ASIA: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REGIONAL ORDER

石斌 主编


南京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亚洲新未来

——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

石斌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 / 石斌主编.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ISBN 978-7-305-17828-3

I. ①亚… II. ①石…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东亚
IV. ①D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233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书 名 亚洲新未来——中外学者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
主 编 石 斌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446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828-3
定 价 8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何成洲 石 斌
蔡佳禾 华 涛

学术委员会

陈 岳(中国人民大学)
陈志敏(复旦大学)
洪银兴(南京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
王缉思(北京大学)
王 宁(清华大学)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
David M. Lampton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Vali Nasr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总 序

《礼记·学记》有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与学原本一体两面，是师生共同的事业，非独教师单方面的“传道、授业、解惑”。进而言之，教师亦须不断追求新知，一流的教学有赖于一流的研究。

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两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为大学，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和美国的两所著名大学共同创办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它于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创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建立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机构，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专业精英，专业方向涵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环境—资源—能源、美国研究和中国研究等领域。

自1986年以来，联合证书项目已连续招收了28届学生。自2006年以来，联合硕士项目已招收八届学生。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近三千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从“中心”毕业，他们活跃在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部门。

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氛围，中外学生共同学习、生活，中外教授联合执教、相互切磋，以及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的管理制度等特征，构成了“中心”迄今在全国仍属独一无二的运行模式。在两校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中心”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跨国教学与研究机构，被海内外誉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典范。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唯有与时俱进，方能长盛不衰。在“中心”即将“三十而立”之际，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心”独特的国际化学术资源，加强对外交流，凝聚研究团队，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中心”师生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心得，反映南京大学的学术风格与研究水平，“中心”的几位中方教授经反复商讨，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本丛书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中国·美国与当代世界”之命题，其义有三：首先，基于“中心”学术架构与办学特色，我们鼓励就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其次，鉴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各类问题密切关联的现实，我们不但要研究中美两个大国各自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当代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更要把中国、美国以及中美关系问题置于当代世界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复次，当今世界各种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全球与地区层次上的政治、经济、贸易、金融问题，还是诸如暴力冲突、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难民以及环境、生态、资源、能源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乃至国际体系的制度变迁与秩序改良、多元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也理当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总之，探讨各类国际与国内问题，考察各种双边与多边国际关系，我们不仅强调中国视角与本土关怀，也倡导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

我们不仅期待海内外校友惠赐大作、玉汝于成，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共襄此举。

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出版之列。必要时我们还将出版各类专题系列成果。我们希望，将来集腋成裘，或可蔚为大观。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让我们携手浇灌我们的精神花园，共赴思想之旅，同铸大学之魂。

论丛编委会

目 录

上篇 共创亚洲新未来:理念与政策

1. 东亚合作与中国:基本瓶颈、新近困难和调试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韩彩珍) 3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长和) 14
3. 美国对欧盟和东亚一体化的政策比较研究(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高兰) 36
4. 西欧在东亚地区主义理论化进程中的作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振江) 47
5. 中美竞争与韩国的战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全在晟) 68
6. 韩国的信任外交与东北亚(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辛星昊) 81
7. 印度的“东向政策”及其在东亚日益增长的作用(印度新德里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马恒德拉·高尔) 95
8. 澳大利亚通往亚太区域主义的中等强国路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托马斯·威尔金斯) 108
9. 亚洲地区秩序愿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艾大伟) 140

中篇 大国关系与地区秩序新态势

10. 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共识与分歧(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石斌) 155
11. 重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地区权力转移中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袁劲东) 183

12. 美国与东亚安全秩序挑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	198
13. 中印美三边关系与亚太安全(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	215
14. 以东盟为中心的合作安全体制(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达尔吉特·辛格)	231
15. 寻求新的东亚安全架构:以东盟为中心的逻辑(越南国立大学社会科学 与人文学院:范光明)	245
16. 中日纠纷及其对东北亚的影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	258
17. 东亚区域共同体的形成:一种日本的视角(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事务 学院:东乡和彦)	264
18. 东亚共同体建设与日本的动力和困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姚远)	275
19. 解读日本与中韩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蒙特瑞国际问题研究院:赤羽恒 雄)	287

下篇 演进中的关键议题

20. 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共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樊吉社)	323
21. 美国精英眼中的南海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	337
22.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的选择(南京大学历史系:舒建中)	350
23. 东北亚能源合作的未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盖伊·克里斯托 弗森)	360
24. 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魏 志江)	386
25. 中国经济有多稳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保罗·阿姆斯特 朗-泰勒)	401
26. 中国周边外交:困境与出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曹云华、刘鹏)	412
编者后记	427

上 篇

共创亚洲新未来：理念与政策

东亚合作与中国：基本瓶颈、新近困难和调试方向

时殷弘 韩彩珍*

引言

东亚区域合作的增进遭遇一系列基本和深刻的瓶颈问题，它们主要是：组织规模与成事效率之间的悖论；区域合作前景面对的深刻的不平衡；“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大国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严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区/准禁区”问题；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加剧或复兴趋势。

与此同时，与晚近数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态相伴，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遭遇复杂难解的新困难，其中有些到了令相关的多边合作努力暂时瘫痪的地步，其中包括：中日激烈对抗且持续不已；南海争端甚为凸显且僵持不下；美国在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事伸张；TPP 谈判被高调倡导、迅捷发动且进程颇快。

在上述大多经久存在和甚为顽固的瓶颈和困难面前，中国应当尝试透视和反思基本问题，积极而不失审慎地从事方略和政策的调试，在相当程度上扬弃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旧路径，践行以两大要点为主要特征的新路径（即着重于确实可行且对中国有益的一部分多边合作和多边体制建设，尤其是那些“次次区域”性质的，同时着重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积极关系，包括作为双边合作之前提的双边关系缓和或双边争端缓解），持之以恒地大力加强周边外交和改善周边关系。

*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韩彩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的瓶颈问题

东亚各国正在从事增进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多边体制性合作或曰一体化)程度的努力,但面临着一系列基本和深刻的瓶颈问题。

首先,规模与效率之间的悖论。

组织涵盖的范围越大,成员间潜在和实在的情势差异、利益差异和立场差异就很可能越大越多样,因而组织的效率就很可能相对越低。这是个常识。主要由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出自战略/外交私利的鼓动和推进,^①东亚区域多边机构性安排的地理涵盖范围越来越大,成员越来越多,所涉议题愈益多样,互相重叠、分野不明、使命含糊的组织体制也愈益增多。因而,大凡全区域和跨区域的多边组织(APEC、东亚峰会、东盟安全论坛等)几乎都过于松散,缺乏明确细致的规范、规则和政策制订程序,很难形成真正的效率。例如,历届 APEC 峰会和东亚峰会本身大都仅仅象征性地发表个宣言,大体上没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成果和可以贯彻的共同政策。与此同时,大致除东盟和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之外,同样由于一些国家的干扰和有关国家间争端或对立的阻碍作用,规模较小、效率则很可能较高的东亚次区域体制性合作与往昔相比,得到的关注和建设努力有所减小。^②

其次,区域合作前景面对的深刻的不平衡。

巨型中国在民族国家规模上远远超过严格意义上东亚的任何其他国家,这与欧洲的情况大相径庭,构成东亚的根本不平衡之一,而如何在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意义上处理这“自然的”不平衡,则缺乏真正的东亚本地历史

^① 参见 Edward Cody, “East Asian Summit Marked by Discord,”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4, 2005; Amitav Acharya, “Competing Communities,” *Pacific Forum CSIS*, No. 70, October 27, 2009; Tsuyoshi Nojima, “Japan, China at Odds on Summit,” *Asahi Shimbun*, April 1, 2005。早在 2005 年年底,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虽不免激越但颇为有理地说,“东亚会议扩展到包括非亚洲国家和美国的亲近伙伴,这挫败了东亚会议的目的”。Seth Mydans, “As an Asian Century Is Planned, U. S. Power Stays in the Shadow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05。

^② 有如下述,“原先意义上的东亚多边合作体制建设已经多半停滞,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大概仍将如此”。

经验。不仅如此,在东亚还有与此相关的国家间实力的大不平衡。特别是,东盟十国即使合在一起集体地衡量,在实力、物质性影响和区域政治能力方面仍相当有限,再加上东盟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实在和潜在的歧异甚或竞争,令它充当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唯一司机”的曾有的抱负愈益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实力和影响大得多的大国(中国或美国以及将来可能的印度)若要成为这样的角色,却“天然地”会引发较小国家的疑忌,还有区域内的同等的大国的抵制和为难,而这反过来又可以抑制这样的大国带领一体化努力的意愿。^①

第三,“内部人”与“外部人”之争,或曰大国间相关的基本战略疑惧。

从地理角度讲,中国天然就是东亚国家,即东亚“内部人”。没有任何人怀疑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蒙古、菲律宾等众多国家一样是东亚国家。然而,按照某些东亚国家的曾经表达或未经表达的真实观点,在起码的地理意义上,其本部或本土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东亚国家资格至少值得怀疑。^②尤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积极地干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和争取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为了抑制中国的继续崛起,不让中国得到自己“天然”应有的区域地缘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权利。^③

尽管如此,美国在东亚区域体制性合作方面越来越有干预性。可以认为,在美国内心,迅速崛起的中国反倒成了东亚“外部人”。因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向自认为是东亚领导者,并且被美国的东亚军事同盟国和外交附庸国认作如此,中国则长期处于美国领导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体系之外,或曰“局外人”。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大增被认为以扩展中国的区域势力,进而占据显著优势为最终目的,所谓“局外人”中国的战略和抱负被设想为逐渐将所谓“局内人”美国的势力从东亚排挤出去,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宣告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真正建设

① 中国政府对此早有敏锐的意识,并且对此一再作了很柔和的旨在释疑避险的表示。特别见 Clarissa Oon, “West Is Welcome in Asean Plus 3: China,”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 2005; 《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11/17/content_18904837_2.htm。

② 众所周知,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的外交大臣冈田克任内也曾公开明确表示东亚共同体不应包括美国。见 Haruko Kgenishi, “Place for U. S. In Regional Bloc: DPJ,” *Asahi Shimbun*, October 26, 2009。

③ 参见 Jackie Calmes, “A Marine Base for Australia Irritates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2011。

性的作用。^① 一句话,仅仅略为夸张地说,中美双方大概实际上都将自己看成“内部人”,而对方是“外部人”,无论它们各自的外交辞令如何。这就是中美彼此间在东亚区域多边主义问题上的根本和深刻的战略疑惧。不仅如此,现在,这对东亚区域内美国的盟国和战略友国的相关态度和政策态势有重大的影响甚或塑造作用,未来对中国在东亚的势必增多的真正战略伙伴也将如此,因而相应地增添东亚区域体制性合作的阻力。

第四,严重和多重的“安全禁区/准禁区”问题。

就创设和培育东亚多边合作体制而言,最大最经久的困难在安全领域。由于种种深刻的原因,东亚的区域安全热点问题几乎难以纳入真正的多边讨论框架,更不用说纳入多边体制去解决。例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自2008年4月以来一直未能重启,先前也从未产生真正可靠的重大成果。中国历来理所当然地不容任何多边体制讨论哪怕是台海政治/军事问题,也理所当然地不容以多边谈判去处理和解决南海领土争端。至于目前处于中日激烈对抗之中的东海问题,中国和日本一向都不愿将它放到任何多边框架内去处理或讨论。还有,美国从来不容任何东亚多边主义政府间论坛质疑它在东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更谈不上让它们受到任何东亚多边机构的规制。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就是东亚区域主义面对的“安全禁区/准禁区”。^② 特别应当强调,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不进行战略谈判,不澄清、调整和体制性地规范中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韩军事同盟的关系,那么很少有可能建设起东亚多边安全体制。^③

最后(当然绝非最次要),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强劲、加剧或复兴趋势。

就民族主义问题而言,东亚的现当代经验与欧洲的大为不同。欧洲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惨祸,终于断定过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义是在当今和未来都应予以否定的东西,从而给欧洲共同体的“后现代”建设奠定了根本

^① 见前面注释3。

^② 2004年时,新加坡国际事务协会主席就撰文强调,亚洲远未具备各区域集体安全体制的条件(Simon S. C. Tay, “Asia Isn’t Ready for Nato-style Alliance,” *Straits Times*, April 21, 2004)。十年后的当今,这方面的情况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③ Yinhong Shi, “The Trajectory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for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 Gordon Flake ed., *Toward an Ideal Security State for Northeast Asia 2025*, Washington, D. C.: Th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 2010, pp. 164 - 165.

的认识条件和思想前提。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以外东亚各国人民带来的一大根本观念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或曰解放无不发生于，甚或依赖于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伴随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在东亚正方兴未艾，而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崛起使情形更加如此。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招致东亚大惨祸和日本民族大灾难的日本民族主义，也在日本右翼的大力鼓动和其他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显著地重新抬头，以致引起东亚诸国不同程度的正当警觉或担忧。就东亚共同体的生成而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问题在于，未来占据优势的究竟是互相对立和竞争的各国民族主义，还是经济互相依赖和安全共同利益？答案仍须拭目以待。^①

二、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新近的困难

多年来，中国是东盟之外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以及多边经济体制创建努力的最重要的推动者。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东盟与区域内一个大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即东盟+1），还有与某些近邻东南亚国家间的诸项多边经济项目合作，随后又比较积极地尝试创设东北亚三国（中、日、韩）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安排（即东盟+3），连同这东北亚三国本身的三边经济体制性合作。不仅如此，在区域安全问题领域，中国还曾是以东南亚为主但超出东南亚范围的东盟安全论坛的主角之一，并且以同样的身份相当显要地参与旨在最终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多边对话和其他多边外交活动。^②

然而，与晚近数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态相伴，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

^① Yinhong Shi,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Overcoming History Obstacles in the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in Jeju Peace Institute,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Northeast Asia*, Jeju and Seoul, ROK; Jeju Peace Institute and Friede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Liberty, 2008, pp. 53-54.

^② 中国的此类努力连同其他，早就使美国的亚洲问题观察家惊叹“北京之星在整个亚洲腾升”。《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在2004年的一篇分析性报道中着力谈论“北京在整个亚太地区积累起来的、对美国的朋友和敌人的新的影响力”。“中国正在用它的经济影响杠杆去支持它的政治偏好。”“北京正在争取它可以主宰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聚合……它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散播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看来是在贸易格局中败着的那方”。“这里（亚洲）的许多人已经坚持认为，未来将属于中国。”Jane Perlez, "Across Asia, Beijing's Star Is in Ascendan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4.

面临日益复杂难解的新的困难,其中有些甚至到了令相关的多边合作努力,至少暂时,骤然瘫痪的地步。取其大者而言,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日本非法的钓鱼岛“国有化”,中日两国间爆发并维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烈度可谓最甚的对抗;深度牵涉到东盟和美国这两大角色,中国与少数东南亚国家间的南海争端大为凸显且经久僵持;奥巴马美国创新性地东亚多边主义领域大事伸张,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大致失去东亚多边主义倡导方面的优势和主动权;作为美国朝向亚太的“再平衡”的主要战略性经济举措,其倡议和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给中国造成了一个较难应对的区域性难题。

1. 中日激烈对抗且持续不已

日本政府悍然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此后又顽固坚持这全然非法的举措,并且坚持实行与中国近乎全面对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致使中日两国间爆发并长久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可谓最强烈的中日对抗。^① 这一局面自出现以来,实质上令创设东盟+3和中、日、韩三边自贸区的努力骤然瘫痪,而且这瘫痪势必持续到庶可预见的未来。如果考虑到中国政府亦将对日激烈斗争当作外交重点之一,赋予它巨大的、往往优先的意义,局面就更加如此。同样必须指出,日本安倍政府出于上述外交和防务政策方向,在所有重大的东亚多边政府级会议上皆以炒作“中国挑衅论”和“中国威胁论”为日本立场重心,严重干扰和损害可有的东亚多边合作讨论,同时多方在东亚太平洋国家做针对中国的外交游说,一样有损于东亚多边合作。

可以认为,只要中日对抗保持下去,东亚多边合作的已有进展和未来潜能就必定有颇大一部分被“锁定”在这对抗之中瘫痪不已,有些甚或毁损殆尽。这当然与中国促进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进展的意愿相悖,与中国在其中的某些重大的经济、政治甚而战略利益相悖。

2. 南海争端甚为凸显且僵持不下

南海争端早已有之,但南海争端大凸显,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很大的问题,有其晚近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第一是美国在亚太的对华战略和外交方向,第二是个别东南亚国家与之相关的躁动,第三是中国大为强化了、

^① 这激烈对抗的基本背景之一,在于它爆发当月《华盛顿邮报》所说“日本的新安全关切”:“日本新的安全关切的最明显迹象两年前出现,在当时的首相菅直人之下,其时他全面修订它的防务战略,将其主要注意力转向愈益增进的中国海军威胁,要求更甚地监察西南岛链。”Chico Harlan, “With China’s Rise, Japan Shifts to the Right,”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2012.

关于南海岛屿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的政府行动和公众舆论。这里只谈前两个事态。从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主要从2010年年初往后,在狭义的战略(即首先与军事有关)的意义上,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方向已经落定,那主要是钳制一个中远程军力很可能持续强劲崛起的中国;同一个时期里,在区域地缘政治意义上,美国主要围绕中国的基本外交方向,或者说它的东亚太平洋外交方向,也已经落定,根本内涵是与在东亚可能获得经久的外交影响优势的中国加紧竞争,并且减小这影响。在这些方向上,美国政府发动了对南海问题的战略性的密集关注,抛出并坚持一项新的大政策,即针对中国,要求南海争端当事国通过多边框架处理争端,并且经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在个别东南亚国家看来,这等于是有了一项重大的“背书”,只要就南海岛屿和相关水域与中国吵闹、对立和争夺,就很有可能获得美国的同情、外交声援和战略奖赏;而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躁动提供了美国争取在战略上钳制中国、增加中国对外关系困难、缩减中国东亚影响的一个重大机会或重大方面。^①

凸显且僵持着的南海争端给中国—东盟关系增添了新的复杂性和重大困难,而中国—东盟关系以及相关的东亚区域次区域多边合作是中国一向重视、一向着意“关照”的。问题首先在于,东南亚的南海争端当事国与非争端当事国俱为东盟成员国,后者有时不得不使这特殊关系优先于南海问题上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个原因,东盟作为一个集体采取并坚持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处理南海争端。这一立场不能被中国接受,因为非常明显,仅有关海洋权益的《联合国海洋法》不是,也无法作为处理南海领土争端的依据。南海争端越凸显,因这争端而发生的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对立或对抗越激烈,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困难和紧张也就可能越厉害;^②如此,以东盟和中国为两大积极角色(先前多年是主要积极角色)的东亚区域次区域多边合作进程也就相应地越受损。尽管在过去数年里,中国与东盟双方以及中国与南海争端主要当事国之一越南之间数度做过有重要

^① 时殷弘:《南海争议与中国战略》,《紫光阁》2012年第9期,第42—43页。

^② 几年来,这方面最紧张、最困难的局面发生在2011年11月的东亚峰会闭幕会上,当时中国总理不得不“来而不往非礼也”,以严正和冷静的表态对付美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包括柬埔寨和缅甸以外的大多数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做的某种“围攻”。见 Jackie Calmes, “Obama and Asian Leaders Confront China’s Premi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11。又见《温家宝在东亚峰会上就南海问题阐明中方立场》,2011年11月19日,中国广播网。